

守望,离其核心价值渐行渐远。

3. 行政化导致现代大学教育主体缺位。大学的根本价值在于育人,大学的育人功能是通过师生之间的教育活动实现的,因此师生之间的教育活动是大学的中心活动,大学管理的价值就在于满足教师和学生的需要,以实现育人价值。也就是说,在大学教育中,行政管理应当服务于教师、学生及其教育活动,是从属于教育的工作。但在行政化体制下,大学却出现了教育与行政的本末倒置,大学教育陷入了主体缺位的困境。

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对大学下放了一部分教育教学管理权力,但大学并没有遵循学术的逻辑对这部分权力进行二次分配,而是将其集中于校级领导和职能部门,形成了校级集权管理^[3]。在大学教育过程中,本应属于教育主体的权力却掌控在校级管理层,师生被客体化,丧失了应有的主体地位,成为行政领导和职能部门管理的对象。这也说明,在大学办学自主权改革中,行政化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强化了。在行政化体制下,师生的需要遭到漠视,人才成长的规律得不到遵循,造成大学育人功能的异化,师生不是在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不是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而是在做他人决定的事情。如,在教育目标的确定上,教师和学生没有话语权,更不可能对教育目标的确定发挥什么影响。这就是说,教师和学生对于自身在教育教学中所追求的目标不但没有决定权,甚至连话语权也没有,这些目标都是由各级行政组织所决定的,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代替教师和学生决定了他们应当追求的教育目标。在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的选择上,不仅学生毫无话语权,而且教师的影响力也是非常有限的。开设什么课程、利用多少学时、选择什么教材、教授什么内容等,大都由行政管理部门定出原则框架,有的甚至还要具体地定出课程名称、学时,指定教材和教学内容。这样一来,教师和学生的作用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总之,在大学教育教学过程中,行政化导致师生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实现,师生缺位现象普遍存在,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代替师生思考和决策成为常态。

二、现代大学本质的演变

大学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在古代大学向现代大学转型的过程中,其本质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现代大学既有其现代性的开拓,也有其传统性的坚守,在新的时代和新的环境下,传统中富有生命力的元素得到了继承和弘扬,富有时代精神的现代特征更成为现代大学的标识。

1. 现代大学是一个特殊的学术共同体。“大学是一个由学者与学生组成的、致力于寻求真理之事业的共同体。”^[4]这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特点之一。学生对教学的需求,是大学产生的原动力。“没有学生,可能会有研究院、学术研究中心,但绝不会有大学。”^[5]在大学的发展历程中,作为知识的传播者与创造者,教师始终是守护大学文化、保障大学学术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从早期的大学到今天的大学,教师与学生作为一对相互依存的主体,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与创新中,履行了各自的学术使命。

大学因教育而存在,师生因教育而结成共同体。师生是教育的主体,本质上也是大学的主体,享有对教育的决定权和大学的经营权。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大学出现了更多的非

学术性事务。为了使大学更好协调运转,行政管理被从学术事务中分离出来,出现了专门从事行政管理的部门和人员。尤其是当现代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功能日益多样化,行政事务愈加繁杂,庞大的行政管理部门和管理队伍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行政与学术共同组成了大学的双驾马车。由此,现代大学从由最初师生结成的传统组织发展成为学术组织与行政组织并存的二维结构体系,同时呈现出学术属性与行政科层属性的特征。但大学本质上是“围绕学科和行政单位组织的矩阵组织。作为从事高深专门知识加工和传播的高校,学科知识是组织形式,是大学结构的基础,是学科而不是行政单位把学者组织在一起”^{[4]124}。因此,以学术为主的行政与学术和谐共治,成为现代大学不断前进与发展的内在要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使大学向着“多元化巨型大学”发展,传统的部分与整体紧密相联的有机体成为一个“不一致的机构”,它有多个目标、多个权力中心、多个灵魂,它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座城市或一个城邦”^{[6]10}。大学成为学生、教师、行政管理者、家长、校友等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约束的关系。在多重关系的影响下,现代大学便出现了行政化和商业化的风险,其作为特殊的学术组织的特征需要通过坚守来维系。在现代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坚守便能保持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逻辑发挥防火墙的作用,隔离或消减行政化和商业化的影响,维护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反之,行政化和商业化便大行其道,学术共同体徒具形式,现代大学便沦为行政的奴婢、商业的仆从。

2. 现代大学核心功能在于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才。大学因人类文明社会培养高级人才的需要而产生,是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不曾缺少的社会组织。《学记》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7]。我国古代大学主要以儒学为基础,培养博古晓今、知类通达、化民成俗的治国之材。正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8]。我国早期现代大学在救亡图存的使命下将培养中体西用的人才作为唯一的功能。欧美国家早期的大学,不论是以学生为主的大学,还是以教师为主的大学,培养服务宗教的学生几乎是其全部功能。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德国大学引入科学研究,“由科学达致修养”^[9],丰富了人才培养的手段,拓展了人才培养的属性,使心智的修养成为科学研究的使命,开创了现代大学教育的新纪元。当知识传授不再是大学人才培养的唯一目的和途径的时候,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曾任德国柏林大学校长的哲学家黑格尔指出:“社会和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人类的潜能以及一切个人的能力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都可以得到发展和表现。”^[10]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有条件的。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11]。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和批判者”^[12]。显然,19世纪的先哲们所预言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不但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境

界,而且是世界现代大学的核心功能之所在。

大学是维新的,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才才是现代大学从社会变革和自身变革中获得的新功能。正因为如此,现代大学教育在新的时代焕发出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道德文明进步不可或缺的动力源泉。尽管今天的社会离马克思理想的社会还有很大差距,但现代大工业的繁荣和极为丰富的社会物资生产已经开始为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才创造条件,所以现代大学成为造就全面而自由发展人才的摇篮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到现代的必然结果。20世纪以来,欧美国家的大学教育改革,从本质上讲,不论是教育体制改革还是教育内容方法改革,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人才的需要。长期以来,在工具理性的影响下,我国现代大学对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培养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才越来越受到我国大学的关注。尽管如此,在我国大学,工具理性的影响仍然无处不在,不论是人才培养还是所培养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治的工具、经济的工具、职业的工具,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还没有成为我国大学的核心功能。

3. 现代大学的永恒价值在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尽管大学因人才培养的需要而产生,但大学的价值并不只是表现在人才培养上。在培养人才的同时,大学维系了人类文化的代际传承,正因为如此,大学实现了其永恒的存在。“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13]这种永恒的需要是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它既是个人的需要,又是社会团体的需要,同时还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延续的需要。

19世纪的德国现代大学不仅发展了人才培养的功能,而且铸就了大学新的社会使命——科学研究。现代大学在培养新型人才的同时,为社会和人类贡献了新的知识。发展知识能力的获得使现代大学的存在价值有了新的内涵,“大学的无形产品——知识——可以说是我们文化中唯一最强大的因素,它影响各种职业,甚至社会阶级、地区和国家的兴衰”^[6]。19世纪中后期,美国大学走出象牙塔,突破了大学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传统,倡导直接为社会服务,在更广泛的范围传播和应用知识,彰显了大学的文化辐射力。20世纪中期以来,欧美国家的大学在践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使命的同时,将文化传承与创新嵌入各种功能的中心,保持永恒价值与功利价值之间适度的张力,使其自身既适应了现实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又服务于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目的。

我国大学长期保持了人才培养的功能。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也得到了开发,其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价值开始得到体现。但应该看到,不论是在人才培养中,还是在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中,我国大学所受到的制约还很多,在很多时候,工具价值和功利价值成为主导大学运行的力量,尽管并不缺少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要求,但却都不是为了其自身的目的,而是为了其他工具性和功利性的目的。究其原因,我国大学不但自身缺少一种赖以坚守的内在传统,而且行政化更使得其不能抗拒来自权力部门的干预。

4. 自由与独立彰显现代大学精神。大学担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使命,而这些使命都是通过师生在学科专业领域所开展的学术活动实现的。与社会其他活动不同,大学的学术活动有其自身的逻辑,即按照学术本身的需要,自由而独立地运行并实现自身的价值。不过,这种逻辑并非大学与生俱来的,而是现代大学的发明。不论是培养治国之材的我国古代大学,还是培养宗教人才的欧美国家大学,分别由于受到政治和宗教的强势影响,只能以政治和宗教目的为其目的,学术活动主要依附于政治和宗教势力,主要根据政治和宗教的需要而展开,所以它们并没有形成自身的逻辑。欧洲国家大学的世俗化和德国现代大学科学研究功能的发展,使学术活动摆脱了宗教的羁绊,开始遵循其自身的逻辑运行,大学本身由此确立了新的理念和精神。从此,大学不再是宗教的附庸,而成为了具有独立价值的学术组织。随着学术逻辑的张扬,大学逐步建立了与政府、教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新型关系,获得了本质上的独立性。

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和普及化,社会对大学的要求和影响不断扩大,大学的社会功能从来没有如此多样而强大,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日益复杂多样且变动不居。毫无疑问,大学的自由与独立精神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社会的影响,自由与控制、独立与依附成为现代大学所面临的两大现实挑战。欧美国家大学依靠其深厚的学术文化传统,在自由与控制、独立与依附的博弈中,在保障自由与独立的内在品格的同时,主动面向社会,建立起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动力源泉。

我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不具有自由和独立的品格,这不单是由于政府控制的结果,而且还因为我国大学自身缺乏与生俱来的深厚的学术基础,学术的逻辑在我国现代大学创建之时未能得到培植,在后来的发展中又未能受到重视。所以,长期以来,在与社会的关系上,我国大学鲜有主体意识,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在行政化体制下,更难以获得自由与独立的精神。正因为如此,我国大学的学术价值不能得到尊重,学术活动的功能往往承载了太多学术以外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难见学术的繁荣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回归现代大学本质之道

行政泛化,本质迷失,是我国现代大学之困。推行去行政化改革,回归现代大学本质,高扬现代大学精神,创建高水平大学、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根本任务。

1. 回归学术本位价值。我国大学与社会无缝对接,大学所面临的社会影响无处不在,既有来自社会权力部门的控制和干预,也有来自经济部门的利益交换和博弈,还有自身所开发的各种营利性计划或项目。因此,在我国大学的运行中,工具价值、功利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博弈贯穿始终,但由于行政化,学术价值难以发挥主导作用。去行政化改革就是要根据大学的组织属性,改变大学从属于政治或政府组织的体制,使学术使命成为大学的最高价值追求,使大学在学术价值与工具价值、经济价值的博弈关系中,能够将学术价值置于中心位置,重构各种价值冲突的合理张力,捍卫现代大学的学术本质。

回归学术本位价值,既是现代大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

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的根本要求。回归学术本位价值,我国大学应当进行深刻的变革,在学术活动及相关活动中,(1)应以学术价值为决策的最高准则。大学决策和工作部门应自觉地以是否有利于学术发展,是否符合学术的内在要求为准则,研究、讨论和决策有关问题。(2)根据学术发展的要求配置和使用教育资源。资源的流向反映大学的价值选择,资源的使用决定大学价值的实现。大学资源配置和使用应当最大限度地为学术目的服务。(3)按照学术标准评价大学发展。大学的办学成就和师生员工工作绩效的评价只能看学术的成长和质量,以及为之服务的情况,不能以学术以外的标准来评判。(4)建立以学术价值观为核心的大学文化。营造一个尊重学术、敬畏学术、追求学术、服务学术的大学氛围,使学术成为大学文化的核心,学术发展与繁荣成为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愿景。

2. 回归学术组织责任。我国大学是开放的社会组织,在担负学术组织基本功能的同时,还承担了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功能。由于行政化,我国大学往往重外部责任更甚于内部责任,重非学术责任更甚于学术责任,因为外部责任和非学术责任主要是由大学的上级主管部门和大学内部党政部门所确定的,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大学经常举办各种政治活动,执行各种政治任务,参与社会政治,承担维护安定团结、政治稳定的责任,而这些政治活动和责任也是通过大学党政部门强力实施的。另外,由于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或默许,加上大学内部党政部门的决定和鼓励,大学还承担了创收的责任、金融借贷的责任、发展经济产业的责任,不少大学教职工在担任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外,还创办和经营生产公司,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不仅如此,由于行政化,大学在履行学术责任时,也融入了很多政治的、行政的和经济的要求,使学术责任偏离了其自身的目的。大学负重办学,承担了许多不应由大学承担的责任。因此,回归现代大学本质,必须改革大学的行政化倾向,消除行政化的影响,使大学轻装前行,更好地履行作为学术组织的责任。

回归学术组织责任,我国大学应当厘清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关系,消除学术组织政治化、经济化的倾向,全面履行学术组织自身的责任。具体而言,第一,科学地区分大学学术功能与政治、经济功能的关系。现代大学具有政治、经济功能,但这种功能更多地是通过学术功能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直接的政治、经济活动实现的。也就是说,大学并不应当直接承担政治、经济责任,大学的政治、经济功能具有间接性,是学术功能的衍生产品。第二,全面履行学术责任。我国大学应当专注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学术功能,遵循学术发展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发展学术、繁荣学术。第三,在学术责任中实现大学的现实价值与永恒价值的统一。不论是人才培养还是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具有现实性和永恒性,顾及一点而不及其余,都不可能完成现代大学的使命。

3. 回归学术逻辑导向。在行政化体制下,我国大学既不可能具有独立性也不可能享有充分的自由,只能在工具理性的导引下,以类似于社会政治或政府组织、经济组织的方式办学。实际上,这种办学不但难以全面、充分地履行学术组织的使命,也不可能为政治、经济部门提供适切的服务。改革行政

化倾向,还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本来面貌,使其按照学术逻辑办学,是我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

回归学术逻辑导向,我国大学应当强化主体意识,以学术发展为终极目的,改革行政化管理体制,淡化行政化倾向,加强专业权力,健全教授治学组织机制和运行规范,培育强大的学术文化与精神,为学术发展创造优良的环境和条件。具体而言,(1)探索大学法人治理体制。根据大学的社会法人地位要求,遵循学术组织的使命,建立相对独立于外部党政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改善权力配置结构,赋予并保障师生参与治理的权利。(2)建立服务于学术发展的大学运行机制。优化大学资源配置,转变大学行政职能,建立健全学术活动的服务和支持体系,使学术发展成为办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建立教授治学的组织机制。大学的各种学术活动都具有专业性,必须依靠具有专门学识和修养的专家学者才能得到适当的处理。在大学的各级各类管理组织机构中,应建立健全教授参与制度,为充分发挥教授的学术修养和专业智慧的作用创造有利的条件。(4)大力培育大学学术文化。政治和行政文化强势,学术文化薄弱,是不利于大学回归学术逻辑导向的。我国大学应当从调整价值追求入手,树立学术至上的价值观,培育丰富而深厚的学术文化,用学术文化浸润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使学术价值成为每一个师生员工的自觉意识,并以其指导自身的行为。

(别敦荣,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徐梅,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济南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湖北武汉 430074)

参考文献

- [1] 别敦荣.我国现代大学制度探析[J].江苏高教,2004(03).
- [2] 衣俊卿.论20世纪的文化状况[J].求是学刊,2007(06).
- [3] 别敦荣.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估[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9:103.
- [4] 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 [5] 弗兰克·罗德斯.创造未来:美国大学的作用[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03.
- [6] 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M].高铭,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7] 礼记译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57.
- [8] 论语·大学·中庸[M].上海:中华书局,2011:5.
- [9]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58.
- [10]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6.
- [11]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85.
- [12] 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38.
- [13] 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6.